

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猜想与反驳

王 洪 才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大学模式”是中国高教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也引起了国际比较教育学界的极大兴趣。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露丝·海霍教授提出了她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 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必须建立在中西方文明对话的基础上。客观地破解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 深入分析命题的内涵及现实基础, 对促进中国大学模式的健康成长, 促进中国大学更快地走向世界一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大学模式; 露丝·海霍命题; 文明对话

中图分类号: G640; G64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0)05-0006-08

Supposes and Rebutals on Ruth Hayhoe's Hypothesis of Chinese University Mode

WANG Hong-cai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f China wants to build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she must have her own university mode, which is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ucceeded in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the core idea of Chinese University Mode introduced by Professor Ruth Hayhoe, who is a famous scholar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is hypothesis is very revelatory to Chinese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so it is valuable to probe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hypothesis and know what it means to us.

Key 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Mode; Ruth Hayhoe's Hypothesis;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露丝·海霍(Ruth Hayhoe)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比较教育学者, 长期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在国际上颇负盛名。她出生在加拿大并在加拿大接受了系统的教育, 大学毕业后赴我国香港地区参加援外活动多年, 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她赴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 专攻比较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 后又在我国复旦大学任教, 之后转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后又特聘为香港教育学院院长, 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并兼任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她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收稿日期: 2010-03-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9-0679)

作者简介: 王洪才(1966-), 男, 河北永年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 从事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取中文名字叫许美德。^[1] 由于她成绩卓著, 1998—2001 年被推举为世界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学会会长。她著有多部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专著¹, 其中《中国大学 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英文版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该书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曾多次来中国内地大学访问并作学术讲演^[2], 2006 年开始了她的“21 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课题研究, 该课题旨在探讨 21 世纪中国大学的走向, 她在该课题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大学模式: 中西方文明的对话”命题。2009 年 5 月, 露丝·海霍教授一行三人再次来中国内地访问, 其间来到厦门大学, 并向厦大教育研究院的师生展示了他们的研究进展^[3], 其间又特别阐述了她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内涵。该命题激发了教育研究院师生浓厚的探究兴趣, 我有幸聆听了她的报告全过程, 并就“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与她展开了讨论。本文就是这一讨论的延续。

一、“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提出

2009 年 5 月 27 日, 露丝·海霍教授带领她的研究团队来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中国大学模式: 中西方文明的对话》的专题演讲。该演讲题目是她的课题研究主题思想的展示。据她介绍, 课题最终成果的名字可能叫《21 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这一名称表明, 露丝·海霍教授对中国大学的研究视野已经从历史转向了未来, 她在思考未来中国大学的走向。仅从预期成果的名称看, 它似乎与她的另一中文著作《思想肖像: 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构成姊妹篇, 但从其视野看, 显然与她的《中国大学 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构成姊妹篇, 因为前者讲中国大学的未来, 后者讲中国大学的历史。当然也可以把这三部著作看成是历史——现在——未来三部曲, 如此就是一部中国大学发展史研究的系列长卷, 露丝·海霍教授可谓国外系统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第一人。难能可贵的是, 她对中国大学发展充满了期盼, 这就是她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毋庸置疑, 该命题是建立在她长期对中国大学发展状况研究基础上的, 特别是基于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她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提出中国大学模式问题越来越迫切了, 因为需要对西方大学模式进行反思与批判, 应该汲取中华文明的智慧并实现文明间的对话, 而这一使命只有在中国大学模式建立后才能完成, 中国大学在弘扬中国文化中责任重大。她在中国多所大学所作的《中国大学

从边缘到中心, 或与西方文明对话》的报告^[4]中都贯穿了这一主题, 这强烈地吸引了我们对她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内涵进行探索。

可以肯定, 露丝·海霍教授的命题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是一致的。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 然而在近代遭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而出现式微迹象, 西学东渐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这一时期在中国还出现了西学优越论的主张。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 都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文化的劣势, 只有在国粹派的眼中中华文明才是万古长青的。但不管是哪种论调, 都无法阻止西方文明的大举进攻并进而占据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 但直到改革开放 20 多年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计划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人们无不希望大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中担当重任,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也与此直接相关。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简单地模仿国外大学模式, 必须走本土化的发展路线, 也即要创建中国自己特色的大学模式。可见, 露丝·海霍教授的命题与中国大学努力的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当然, 露丝·海霍教授的命题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即她不只是简单地对中国大学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概括, 而且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继承的基础上, 因为中国大学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 如书院制度就是一例。所以中国大学不应该抛弃历史而单纯地对西方大学模式进行模仿。其次, 她承认中国大学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是对的, 但她提醒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 它有自己的局限, 不一定适合于中国, 所以中国大学应该对之加以分析和借鉴, 应该立足于具有独特神韵的中国文化。再次, 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兴起并非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 而应该是一个超越的过程, 即在吸收西方大学模式的优点, 提升中国文化内涵基础上的超越。所以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过程不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 而是一个文明对话的过程。显然这一判断与全球化多元主义视角是一致的。最后, 露丝·海霍教授从孔子学院的举办中看到了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踪影, 她非常赞赏这种由各个大学举办孔子学院来承担文明对话角色的做法。

可以说, 露丝·海霍教授的见地颇能代表一批有远见的国外学者的观点, 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

国内学者关于建设中国大学模式的意见。

二、“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探索过程

露丝·海霍教授关于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并非完全建立在理论推导或历史文献的收集上,她还把自己的论断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实地研究基础上。她通过走访国内多所大学并与这些大学的领导、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交谈以及与中国教育研究同行的交流来论证自己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也可以说,她是从当下中国大学的具体行动来验证她提出命题的适切性的。

具体而言,露丝·海霍教授的研究团队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实地研究。在研究中他们以深度访谈为主,辅之以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部分数据。所谓质性研究方法,即通过典型的、个案式的调查方式来收集数据并依靠研究者的理解来解释,所以她的研究团队中除她本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外,还有具有国内教育背景的研究者参与,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出现文化障碍问题。在研究对象上,她选择了12所中国大学进行调查,其中有9所公办大学,3所民办大学。这些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都各具特色或代表性。如在公办大学的综合性大学中选择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大学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农林大学选择了西北农林大学,民族大学选择了延边大学。北京大学代表国内一流大学,其地位是独特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国内唯一坚持不扩招的大学,从而彰显其个性,当然它也是理工科一流大学的代表;厦门大学是南部中国重点大学的代表,也是没有实行合并的大学;南京大学是中国中部地区重点大学的代表,也没有进行大学合并;华中科技大学则是一所基本上由自己选择合并对象的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作为师范大学的代表,也是国内特别强调师范特色的大学;西北农林大学作为农林大学的代表,也是在国内农林大学“去农”风潮中坚持农林特点的大学。西安外事学院、黄河科技学院和蓝天学院这3所民办大学也各具代表性。她之所以选择一所民族大学,是因为她认为目前文明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民族的冲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具有成功的经验,其中民族大学在处理民族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不了解民族大学发展的情

况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大学,当然也很难谈论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她之所以选择民办大学,是因为她认为在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中,民办大学将占据重要的一席。她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中国大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上的,因为在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书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绝大多数成功的书院是民间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私立或民办的。因此,她的研究角度对我们很有启发,从而使我们的眼光不仅仅盯着几所“985”大学、“211”大学,或仅仅盯着公办大学。

露丝·海霍教授的研究团队访谈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的高层领导,访谈的重点是1999年以来大学发展的情况,突出大学是如何处理规模扩张和建立一流大学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讲就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问卷调查则针对学生,调查他们在接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变化情况,如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问卷设计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这些学校虽然代表了中国大学的不同侧面,但在办学水平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很难采用同一标准问题来提问。如问“你是否感觉到校园内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这对“985”大学而言可能是个真问题,但对民办大学而言则可能是个假问题。显然他们是根据对国外私立大学的理解来解读中国民办大学的,存在这种误差也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境外或国外学者在看问题时虽然能够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具有“局外人”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很多时候是相对的。不管如何,这些细节并非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她考察问题的视角。

最令人钦佩的就是她的文化观察视角。她认为传统的大学模式是在“西方一元价值”^④支配下形成的,这种大学模式有它的缺陷。她坚持认为中国大学的真正成长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生长力。她认为中国文化里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国大学应该担负起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使命。实事求是地说,由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大学应担负起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使命真令我们许多国内的学者汗颜。长期以来,国内许多学者的眼睛只盯着国外,尤其是美国,而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抱无所谓的态度,很多时候是持否定的态度。尽管有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大学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使命问题,如“国学热”的兴起就是一例^⑤,但总体而言,这些声音比较微弱,也不够坚定,甚至没有底气,有时也不够理性,偶或还有一丝国粹派意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声音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从国外或境外传入的,是由一部分旅居国外的华裔学者提出并经过我们的部分改造后在国内流传的。这些华裔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如杜维明、成中英等,他们一直致力于中西文明对话、融合,坚持中西文明互补论,认为中西文明各有所长,应当互补,否则就会出现发展的偏失。这些学者一般兼有中西文化学术背景,能够看到彼此文化中的优劣,所以提出了用中华文明之长来补西方文明之短的建议^[6]。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传统中国人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的不足,从而对我们客观、理性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颇有裨益。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在解放后开始学苏,改革开放后主要学美,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丢弃中华文明,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中华文化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即使那些全盘西化论者,其主张也多半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他们深谙中国文化中的“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的道理,目的在于用西方文化来矫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偏失。即便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极端举动,如清末彻底废除科举考试,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虽然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伤及根本,因为这些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三、“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所面临的难题

露丝·海霍教授从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中看到了中国大学发展中的一些特色性的东西,如中国政府推动的“211”工程、“985”工程、“大学合并”、“大学扩招”、“独立学院”,以及目前中国大学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孔子学院等。其中孔子学院现象尤其引起了露丝·海霍教授的关注。孔子学院是以国内各个大学的名义举办的,而不是由政府出面举办^[7],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已为许多国外学者所称道。如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交往深厚、对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挪威学者阿里·谢沃教授在来厦大教育研究院的演讲中就特别讲到了他对此的感受。特别有趣的是,他也涉及中国大学模式问

题,而且是从大学模式比较的角度谈的,只是他还没有清晰地提出中国大学模式这个概念,而且缺乏后续的研究。^[8]这说明,许多比较教育学者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大学模式,而露丝·海霍教授尤其重视中国大学模式中的文化特色问题。她还认为中国的书院精神将在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书院有很大的学术自由,而且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书院对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她特别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大学发展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使她感受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大学模式的存在。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中国政府一直在对大学采取放权路线,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但仅凭这些证据恐怕还不能完全支撑起她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

在露丝·海霍教授的概念中,“中国大学模式”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它是在继承以往大学模式前提下实现的超越。所谓继承,即不否定先前的西方大学模式,如洪堡的德国大学模式(也即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模式),也不否定美国的巨型大学模式(此即露丝·海霍教授心目中的美国大学模式^[9]),因为在美国的巨型大学模式中也包含了洪堡的德国大学模式。换言之,美国的巨型大学模式是在洪堡的德国大学模式基础上的超越。那么,中国大学模式的超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该如何实现超越呢?这是最难和最值得探究的一点。从她的报告来看她似乎寄托于中国文化。这一点比国内学者简单地提“本土化”的主张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但正是这一点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因为要寄托于中国文化的话,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经过国外学者改造或转译后的中国文化,抑或当下的中国文化?事实上,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已经掺入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元素,不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了。这既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特色的展现,是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展现。西方文化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中国文化则有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思维品质。这一品质正是许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所津津乐道的,也是许多寄希望于用中华文明拯救世界文明危机的人士所大力宣扬的。^[10]露丝·海霍教授所推崇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杜维明教授就持这个立场。当然仅靠这种思维方式还不行,还必须有具体行动。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思想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不足,但要变成具体行动则涉及真正现实利益的考虑。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

在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中国文化一方面讲求“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则讲求“大一统”。许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矛盾现象,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意地取舍,从而割裂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我个人认为,这个矛盾性并非中国文化的劣势,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源,它也是文化复杂性的写照。文化正如人的个性一样是复杂的、多面的,从而也是丰富的、发展的。当人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对大学放权的时候,就认为这自然会导致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大学自主性的增强及学术自治的结果来,但这样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是按照西方分权与集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大学的运行要复杂得多。在中国,如果在政府对大学进行放权的同时没有随之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变革和文化建设,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办学活力就不会自动增长。

在中国,人事制度变革始终是一个关键,因为干部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在人事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大学管理文化进行变革,否则就难以实现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因为沿循传统的思维路线最终必然导致一切唯上是从。从管理制度看,最急迫的是要在政府管什么和不管什么之间确立一个明确的法律界限,因为这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要做到这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学事务是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体制改革的趋向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而不包办具体事务,但在绩效主义的压力下,政府总想施加全面的影响,这仍然是一种包办一切的冲动。正因为政府对绩效目标的追求,从而总希望引导大学校长高度关注政府的计划目标,这样大学在无形中就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力。要打破这一循环,就必须有超强能力的大学校长出现,他们能够超越这一局限,从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但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校长而言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政府放权只是表面的,它只是一种管理方式的转换,即从直接的行政命令变成了间接的物质刺激。

如果没有真正的放权,而要实现大学内部治理方式的变革也是不太可能的。人们曾设想通过实施学术与行政绝缘的办法来进行大学治理方式的改革。这显然是违反中国文化的逻辑的。中国文化本

质上是一元主义的,让学术与行政绝缘就是在推行多元主义,这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合。在改革进程中必然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显然不可能推行多元主义。所以学术独立的主张不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要求。而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的思想则主张在学术独立和学术依附之间进行调和,这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真谛。所以中国大学未来之路只能走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同时又要保持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特点,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真正含义。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

所以,中国大学模式的出现不可能简单地寄托于中国文化,而必须寄托于大学校长的创造性。文化不能自动创新,它必须有自己的执行主体,大学校长才是具体的执行主体。这样的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自己独立的学术主见,很强的人格魅力,并且具有突出的学术成就。如同19世纪初叶创造德国大学模式的洪堡^[7],他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处理大学的个性和统一性及学术需要与国家需要的关系问题,而且他的包容能力非常强,既不专断,又不以哗众取宠为能事。这样,中国大学模式建设才有希望。一句话,中国文化的活力因子是普遍存在的,但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有创造性的个体,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创造性的主体存在,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是没有希望的。

四、“中国大学模式”的创造过程

目前中国大学尚没有形成成熟的运行规则,因为中国大学所面临的境况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没有什么成例可循,无论是西方大学模式还是中国书院模式都无法直接运用于当下情景,大学只能依靠大学校长自己的信念来运行。对于大学校长而言,如果他没有自己成熟的大学信念,那么大学就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摸索,此时大学的运行状况只能取决于大学校长的个人魅力和微观政治活动能力^⑧。换言之,大学校长所建立的活动圈子如何,决定了该大学争取到的资源状况。但这种微观政治活动能力还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还难以形成关于大学的信念。这些大学校长只能获得一种暂时的物质上的资源,很难获得一种永久性的精神上的资源。这种精神上的资源主要靠声望来获得。

中国大学模式必然是建立在巨大声誉基础上的。从目前情况看,要突破这个关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仍然是行政一元话语时代,大学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是困难的。如果大学没有自己独立的

声音,就很难赢得巨大的声誉。如今大学治理陷入了一个困境,即一方面要给大学放权,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行政干预。所以中国大学的发展最终寄托于开明领导的出现,由他们进行创制才能建立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这样中国大学才有希望,中国大学模式才能出现。而仅仅靠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式的办法是不足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如果把举办孔子学院说成是中国大学的一种特色,可能是差强人意的。目前,孔子学院还只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海外对中国大陆市场的经济需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虽然孔子学院是以各个大学的名义举办的,而且也确实是由各个大学具体管理的,但仍然由国家统一组织,其领导机构就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该机构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孔子学院数目不断扩大而呼唤加强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在发展上具有统一性。就目前孔子学院的功能看,它与国内许多为了适应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要求而开设的外语培训班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当然汉语推广与中国文化推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语言这一工具,推广文化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只能期待未来孔子学院的功能从语言教学培训转向文化交流了。

当然,“211”工程、“985”工程就是直接的国家行为。这一举措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4],但它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如它刺激了大学之间的盲目攀比,大学的个性反而被抹杀。由于这一工程的实施涉及资源分配和大学地位的变化,所以许多大学在争先恐后地赶往同一目标,无形中使政府的控制力量大大增强。大学合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合并大学只有一个目标,即获得政府的大量投资。这一政策的后遗症现已暴露出来,即它诱发了大学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引发了大学规模的极度膨胀和债台高筑,还激化了大学内部争权夺利等潜在矛盾,这远非当初所能够预料的。

境外或国外学者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大学的发展境遇,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大学一方面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同时又迅速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显得非常神奇。这说明他们只看到了表象,并没有看到实质。中国大学确实经历了这一过程,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中国大学发展政策总体上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是需要个性的,另一方面又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则是去个性的,这正是当前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

主要困境。实事求是地说,任何成功的大学首先都必须具有自己的个性,而这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困难重重。

五、“中国大学模式”的真实意蕴

不管怎样,我还是同意露丝·海霍教授的期待,中国大学模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我隐隐地感到,在中国大学模式建设过程中起先导作用的是经济成功,而不是传统文化。经济成功有多种模式,威权主义也是经济走向成功的一种模式,这在东亚地区已经获得了证明,但这种经济成功并不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可以设想,在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大学发展就没有依托,大学的文化载体功能也就发挥不出来。所以,弱的经济基础就无强的文化可言。那么,究竟是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决定中国大学模式的成功呢?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振兴及其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大学模式。露丝·海霍教授说德国大学模式诞生时德国的经济也不发达,而美国大学模式诞生时却是与经济发展同步的。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德国大学促进科学研究发展并带动经济发展最后使德国强大起来,就不会有德国大学模式的出现和传播。如果美国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和后来的超级大国地位,也不会出现国际上一致推崇美国大学模式的局面。此外,美国大学模式的代表也不是今日的巨型大学,而是在19世纪末兴起的州立大学及其所提倡的社会服务精神,最典型的就是威斯康星精神。因而,美国大学精神就是社会服务,也就是人们所公认的现代大学的第三大职能。这一点已为美国公立大学所普遍认同,甚至得到美国私立大学的认同。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就撰有《走出象牙塔》一书,该书所倡导的正是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精神。^[8]

当然露丝·海霍教授所说的巨型大学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大学精神。因为巨型大学标志着大学功能的多样化,其中自然包含了社会服务的内容。巨型大学概念是已故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克尔提出来的^[9],也是被学术界认可的,以之来形容大学功能已变得非常多样了。甚至可以说今天大学的功能是如此的多样,以至于要把它们统一起来都很困难。巨型大学说明今天的大学是一个复杂性组织,而不是传统的单一学术性组织,它代表了大学功能的变革趋向,说明大学与社会的边界

已不再非常清晰。这是大学走向社会中心后的结果,但也是不少学者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更愿意看到古典大学模式,即那种象牙塔模式——大学追求纯粹学术,不为世俗利益所驱动,尽管这在当代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大学模式究竟能够为大学发展提供什么?我们说德国大学模式发展了大学的职能,使大学从单一的教学职能变成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双重职能,美国大学模式又使大学职能变成三重的,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结合,而且它们不是相互脱离的,这样美国大学更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气息。中国大学模式是改造美国大学模式还是在原来德国大学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抑或再把法国大学模式混合进去?这个出路从哪里找呢?是从中华文明中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的是一个假命题,因为这很难获得确定的答案。

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许多精髓,这些东西是灵活的,不断发展的,如果要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无疑是痴人说梦。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经过多次转译后的中国文化,其中已增加了许多异域文化的特征。换言之,他们所接受的是经过多次重新阐释后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并非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无论如何,这种新的阐释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用来指导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则是另一回事。

中国大学模式建设必须基于本土的实践,特别是本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可能想当然地搬用在异域语境下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歧义性存在从本质上讲是无法克服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共同探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事实上就是对中国文化进行一次新的创造。不可否认,这一创造的主体既不可能是西方学者,也不可能是海外华裔学者,只能是本土的学者,尽管本土学者是后发的,但他们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他们是实践主体。在其中,西方学者或华裔学者能够发挥媒介或诱导作用,他们的理解为本土学者的深入理解提供参照,促使他们更好地承担起创造主体的责任。

我始终认为,支撑中国大学模式存在的必然是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文化的创造与再生就不可能。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是经济的振兴。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文化才可能登场。也即文化创造比经济发展要困难得多,文化创造是一种文明的推进,是提出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提升人的

精神生活境界,进而指导人的行为方式,包括经济活动方式、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而这些都是经济发达后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的原发性发展,文化建设只能是纸上谈兵。文化发展是为了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目的是使经济运行更加健康和理性,因此我们始终都不能把文化看成独立体。文化是人对更高级生活需要的反映,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只能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氛围中。文化是一个熔炉,它可以使经济形式越来越精练,使经济发展越来越脱离野性,使社会越来越文明,所以文化也在发挥着经济守护人的作用。

文化建设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急迫间获得成功。如果把中国大学模式建设作为一个世纪的期许是有道理的,而试图急迫间建设成功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大学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也是一批最具创造性的大学校长的创造活动,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目标清晰、可以用“投入-产出”公式来计算的过程。换言之,它并非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激情涌现的过程。当一个环境能够激发出大学校长的创造热情时,中国大学模式才可能产生出来,这是一个复杂的结合,并非可以预期的。如果中国大学不能出现一批杰出的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模式的出现是不可能的。这批大学校长首先是学识渊博的,其次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从而也是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的。他们的志向并非在于自己的学术发展,而在于创造出一个激发学术发展的机制,带动学术的整体发展,他们具有学术的睿智,具有非常强的人格包容性,具有战略眼光,从而能够进行大学发展机制的创造。^[10]正是由于他们的作为,才能促使大师云集、流派纷呈的学术鼎盛时代出现。

六、结 语

目前的“985”工程或“211”工程等举措虽然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促进作用,但远远不够,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绝不可能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进行,也远非金钱所能解决的,更不是靠一些硬性指标评比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学术发展的引领上,而这又建立在学术界对该大学所追求价值的普遍认同上。如果没有卓著的声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不可想象的。大学合并并不必然

带来学术水平的提升,但确实提供了促进学科相互融合的机会,而要实现真正的融合则必须进行管理体制革命,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大学发展的瓶颈。相信只有在管理体制上突破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能真正起步,否则更多的投入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诱发更大的急功近利心态,甚至导致更大的学术腐败,如此就会使学术声誉受损。果真如此,则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就更远了。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为我们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注释:

¹ 露丝·海霍教授出版的中文专著主要有:《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东西方大学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④ 关于“西方一元价值”究竟是指什么,在露丝·海霍教授的报告中没有论述,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意见,笔者猜想她可能是指理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四) 孔子学院总部设在北京,国务院设“国家汉办”(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NOCLF)负责总管和统筹孔子学院开设事宜。

^{1/4} 笔者2006年10月24—25日参加了阿里·谢沃(Arild Tjeldvoll)教授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开设的“The PhD Cours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聆听了关于中国大学发展的意见。谢沃教授本人一直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并向西方学者宣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其代表作是:《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 露丝·海霍教授的“美国大学模式”,是指克拉克·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巨型大学模式。这一观点与中国学界普遍认同的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美国大学模式不同。

^{3/4} 新儒家思想起初是指宋明理学(参见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1—3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现在则指致力于恢复传统儒家在中国统治影响的一派学者的思想(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82107.htm>)。

⑧ 微观政治活动能力指的是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

领导力,它与宏观政治活动能力不同,宏观政治活动能力指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政党建设的领导能力。

(七)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举措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日本出现了大学合办的提议,德国出现了重点扶持一批大学的决定,英国政府改革了大学资助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也计划拆资支持部分大学走向世界一流。

参考文献:

- [1] 许美德. 圆满: 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M]. 周勇,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2] Ruth Hayhoe(许美德)教授将来我校作学术报告[EB/OL]. http://www.nwnu.edu.cn/Article.do_id=376.html; 国际著名比较教育专家许美德教授做客“新世纪论坛”[EB/OL]. <http://www.cunews.edu.cn/Article/huanan/zhaozheng/200906/42328.html>.
- [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许美德教授与查强教授作精彩学术报告[EB/OL]. <http://210.34.22.108/news/hqj/200966122855.htm>.
- [4]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在我院做报告[EB/OL]. <http://che.xmu.edu.cn/news/hqj/2007530110711.htm>;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Ruth Hayhoe(许美德)受聘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EB/OL]. http://net.xinhuanet.com/market/school/2008-10/07/content_14573687.htm.
- [5] 李满龙.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现象——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EB/OL]. (2008-05-04)[2010-01-27]. <http://www.cntheory.com/news/Lltwllw/2008/54/085410711D11K25AC549F976GF4EJ.html>.
- [6] 杜维明. 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对话西方[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1-12. [2010-01-24]. <http://sspress.cass.cn/news/7044.htm>.
- [7] 博伊德, 金. 西方教育史[M]. 任宝祥, 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330.
- [8]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M]. 徐小洲, 陈军,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102-245.
- [9] 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M]. 陈学飞, 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7: 95-98.
- [10] 王洪才. 大学校长: 使命·角色·选拔[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32-37, 66-100.

(本文责任编辑 曾伟)